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現代中國革命精神的底蘊： 儒教和（或）基督教，抑或是其他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Fan, Zhihui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04 23:16:08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901

現代中國革命精神的底蘊：儒教和（或）基督教，抑或是其他

樊志輝

黑龍江大學哲學系教授

南開大學哲學博士

革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主題，是從根本上置換政制正當性的現代性事件。相對於西方學界，漢語學界對革命的學理研究還相當貧乏。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蒐集了顧彬（Wolfgang Kubin，德國波恩大學〔Universität Bonn〕漢學系教授）、劉小楓、王錦民、啟良四位學者的四篇學術論文，編輯出版了《基督教、儒教與現代中國革命精神》¹這部有確定主題的文集，以表明漢語學界對現代中國革命精神的關注。

這場漢語學界關於中國現代革命精神的討論，是由德國漢學家顧彬的一篇論文〈「上帝病」——人病——論中國和西方的不完美性問題〉（頁 7-25）所引起的。在這篇文章中，顧彬勾勒了從法國大革命到中國革命的內在邏輯：即「上帝死亡」後，人如何憑藉自己的精神來實施自我拯救、自我成義。沒有上帝之後的新人想象，是宗教的人的世俗化版本。在顧彬看來，「烏托邦、新人、暴力」是「塵

1. 顧彬、劉小楓等，《基督教、儒教與現代中國革命精神》（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以下凡出自該書的引文只於正文注明頁碼，而不另作注。

世的三位一體」，追求完美性是現代世俗精神的想象，是基督教救世理念的世俗化。因此，不僅歐洲的現代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是基督教思想的世俗化形式，而且現代中國革命思想同樣受到西方基督教世俗化思想的影響，因此現代中國革命思想也是基督教思想的世俗化樣本。

劉小楓撰〈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一文（頁 27-114），對顧文給予回應，他直斥顧文觀點為「謬論」，認為顧文每一個論據都經不起歷史社會學和思想史的推敲，不足以支持他的論點。但劉小楓進一步認為顧文的論斷雖經不起推敲，「論題卻不虛」。劉小楓所要思考的是「如果現代中國革命帶有宗教性質，那麼，這種宗教性質是甚麼，其精神資源是甚麼，它又如何與受現代西方現代化刺激而引發的中國現代革命思想融構？」（頁 34）在劉小楓看來，康有為、孫逸仙、蔣介石、毛澤東都是「儒教革命家」，他們有着共同的革命精神底蘊——聖人正義論，其差別僅在於改制的具體理念（頁 37）。劉小楓認為中國現代革命精神的興起是現代華夏國家的制度正當性危機緊密相連的。劉小楓通過對「現代儒家的革命理論」、「《易傳》湯武革命論」、「漢代今文家的孔子素王革命論」、「心學成聖論與儒家革命精神」、「現代性語境與中西革命觀的相互格義」、「革命權利與聖人正義論」等方面，對儒家革命理論作精神現象學意義上的考辯。借助如上的考辯，劉小楓以發問的方式表達肯定性的結論：「現代中國革命精神的完美性追求是否真由西方啟蒙運動而來，是否可能源於魯門血書，源於革命立法家孔子的微言？」（頁 74-75）。劉小楓以為，儒教思想面臨的最為根本的現代性難題是「華夏儒教政制的正當性如何與現代民族國家民主

政制的正當性相融構」（頁 91）。儒教革命精神的實質是聖人正義論，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劉小楓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與儒家革命理論之間具有同質性。毛澤東革命精神的氣質與儒教革命精神的氣質是一脈相承的。

王錦民的論文〈《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的駁正〉（頁 115-151）是針對劉文而發的。他認為不可簡單的將古代公羊家的聖人改制精神和成聖人精神視作現代中國革命的精神資源，他以為現代中國革命的精神資源不可能是古代思想順理成章的發展，「沒有來自西方思想的影響，不可能產生現代中國革命精神」（頁 115）王文從文獻考證和史學研究方法上對劉文的一些基本觀點提出質疑，例如他對「內聖外王」、「超越與內在」、「人世的不完美性」的分析，都是對劉文立論之基的顛覆性挑戰，他甚至認為劉文的某些結論是將新儒家思想放大到古代後才得出的。

啟良的〈崇高的悲劇——儒耶二教與現代中國的激進主義〉（頁 153-192）是回應顧文與劉文而發的。他對顧、劉的觀點既有所肯定，也有所保留。不同於劉、顧文中所隱含的某種價值預設和鮮明的個人立場，啟良的文章肯定了顧文的觀點，補充了顧文論證之不足。他認為基督宗教和儒家思想都是中國現代革命的思想泉源。啟良所要追問的是「為何儒耶二教崇高的理想在現代中國會結不出善果？」（頁 156）在啟良看來，儒家的革命精神是聖人崇拜，而聖人崇拜落實於外王事業中則必然導致極權主義的濫觴。至於基督教與中國現代革命的關係，啟良基本贊成顧彬的結論，並對之作作了進一步的補充性論證。

上述幾位先生對現代中國革命精神與基督教、儒教的內在關聯，立足點並不相同，故其結論也自然有所差異。

這裏，筆者也無意對幾位先生有關現代中國革命精神的論述作具體的價值評判。筆者想指出的是：

1. 幾位學者的觀點雖然各異，但論題卻是不虛的。現代漢語學界對現代性問題的研究與反省大多局限於西語語境，而沒有立足於現代性中國問題。現代性中國問題的主題是甚麼？在筆者看來，無非是在現代語境中社會秩序的正當性根據，以及個體身位元根基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是直接相關的。前者是政治哲學的問題，後者是宗教哲學與倫理學的問題。而現代中國革命的問題，即關涉政治哲學的問題，也關涉宗教哲學與倫理哲學的問題。即革命的問題，不僅是一個政治的問題，也是一個倫理宗教的問題。

2. 現代中國的革命精神，尤其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與基督教之間的精神關聯，固然不可簡單的將顧彬的結論視為當然，但劉小楓將顧文的結論視為「謬論」，卻有矯枉過正之嫌。對現代中國革命精神與傳統儒家革命精神之間的內在親和力，劉小楓的分析確有其精到之處，也即是如劉小楓所云，儒家的革命精神是現代中國革命精神的底蘊。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僅僅在於儒家革命精神對現代中國革命精神的內在支撐，而在於現代中國革命精神的實質性內容是否來自西方的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現代中國革命的理論家與實踐家，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並在本土處境與語境下加以實踐時，是否也將作為歐洲馬克思主義的背景的基督宗教精神一併引入中國（如顧彬所言），還是以儒家的革命精神置換了馬克思主義的基督宗教背景。換言之，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論述中，如果真如劉小楓所言，則儒家的革命精神成為了「語法」，而來之於西語語境的馬克思的論述就只成為了一種「修辭」或「語彙」，於是現代中國革命精神內部的分歧，就成為

了廣義的儒家傳統內部的「左派」與「右派」之爭。如此的分析與論點固然看到了現代中國革命精神，尤其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與傳統儒家革命精神之間的歷史連續性與繼承性，卻沒有突現馬克思主義革命精神有別於傳統儒家革命精神的現代性因素。

3. 就現代中國革命的實際歷程而言，傳統儒家的革命精神儘管確如劉小楓所言，構成了現代中國革命精神形成的「前理解」。但需要明瞭的是「現代中國革命精神」與「傳統儒家革命精神」之間的精神結構的「家族相識」或「歷史連續」，並無助於說明現代中國何以最終選擇了一條迥異於傳統的現代之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之路）。僅僅以革命精神氣質的一致性來說明現代中國革命精神是傳統儒家革命精神的「現代版」，是沒有充分注意到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所具有的「現代性」和「基督宗教」的釋義學背景。筆者看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時，傳統儒家的內在氣質的確在起作用，但決定性的因素卻是看中了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現代性」與「宗教性」的雙重特點。就其「現代性」而言，馬克思主義不僅提供了一套現代的革命理論（有傳統過渡到現代）和現代性的制度安排，也提供了一套現代社會的批判精神與終極的精神安置（以規避資本時代的價值虛無與價值虛偽），從而滿足現代中國對現代化的期盼與對資本主義的痛恨。

4. 《基督教、儒教與現代中國革命精神》一書的幾位作者，尤其是劉小楓與啟良兩位先生，在論述現代中國的革命精神時，不論他們的觀點如何，他們對問題的選擇和切入方式，似乎表明了他們對現代中國革命經驗的某種隱憂。換言之，現代中國革命的負面因素為他們的思想論述

確立了基本基調。現代中國革命於是乎被視為「悲劇」，「幹革命」或「講革命」的「聖人」被視為「大盜」。幾位作者面對「革命事件」的義理分析，固然表現了他們對「革命者」及其導師「聖人」的「道義合法性」與「天道——歷史」合法性的質疑，並試圖從學理上阻斷「革命」的道義合法性與歷史合法性。如此的思想論述可以稱作是一種「反」——「革命」的學術論述。「反」在這裏有二解：一是「反思」，二是「反對」。我們知道，「革命」的暴力作為對社會疾病的治療方法，往往並不是社會改革者（無論是幹革命的還是說革命）的首選方案，而是面對「反革命」的暴力而無法躲避式的無奈抉擇。因此，當我們面對「革命」的歷史殘酷性而進行反思的時候，不能僅僅將自己的認識停留在對革命的歷史價值判斷和思想動因的探尋，而要進一步弄清產生革命的社會機制，並且還需要具體分析革命對社會疾病的治療有效性如何。

現代中國革命精神的底蘊，是儒教還是基督教，還是兩者都有，幾位論者的觀點各不相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並不是簡單的看待現代中國革命精神的問題，而是如何看待現代中國社會的問題。這不僅牽涉到現代中國（共產主義中國）是儒教中國的歷史延續，還是基督宗教的世俗化版本；而且對此問題的認定，還將進一步關涉到分析乃至解決現代性中國問題的主要思想資源與精神資源為何的問題。

如何面對現代性中國問題，是現代中國思想的最大的問題。現代中國思想長期以來不是處於意識形態的自我迷戀，就是意識形態幻滅後的「失語」以及面對西方學術的無休止的「學舌」。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編輯出版了《基督教、儒教與現代中國革命精神》這部文集，表明了現代中國思想界開始具有了自主的問題意識，以及

現代中國革命精神的底蘊：儒教和（或）基督教，抑或是其他

分析問題時所展現的廣博的學術視野。希望這部文集能夠引發中國學人對有關課題的進一步思考，推進漢語學界對中國革命以及現代性中國問題的學理研究。

作者電郵地址：fanzh7194@hotmail.com

Revolution Spirit of Modern China: Confucianism and (or) Christianity or Other Religions

FAN Zhihui

Ph.D., Nankai Universit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book *Christianity, Confucianism and Modern China Revolution*,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n Hong Kong, was written by Wolfgang Kubin, LIU Xiaofeng, WANG Jianmin and QI Liang. It shows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academic on the spirit of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In the four theses, the writers discuss what the basis of the spirit of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is: Confucianism and (or) Christianity or other religions? It manifests that the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China have an independent sense of bringing up question and vision for extensive academic discussion. This book may propel research on the academic theory about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the issue of modernity of China.